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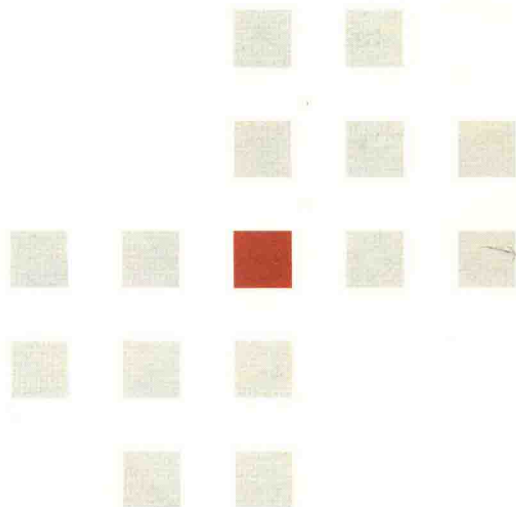


百家文库
BAIJIA WENKU

现代大学 通识教育课程研究

XIANDAI DAXUE
TONGSHI JIAOYU KECHENG YANJIU

龙跃君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现代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

龙跃君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对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全书分通识教育的概念、通识教育课程理论、通识教育课程理论的发展、通识教育课程编制及我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实践展开了系统的论述,引用资料丰富,数据详细,既有文献价值又有实用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龙跃君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667 - 0505 - 1

I. ①现… II. ①龙… III. ①通识教育—研究—高等学校
IV. ①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0477 号

现代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

XIANDAI DAXUE TONGSHI JIAOYU KECHENG YANJIU

作 者: 龙跃君 著

责任编辑: 张 毅 责任印制: 陈 燕

印 装: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 开 印张: 11.25 字数: 209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7 - 0505 - 1/G · 651

定 价: 30.00 元

出 版 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 - 88822559(发行部), 88821006(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 - 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次

导 言

- (一) 本书写作的基本考虑 1
- (二) 现代大学到底怎么了 3
- (三) 现代大学向何处去 6

第一章 绪 论

- 一、问题的提出 10
- 二、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 17

第二章 通识教育的概念

- 一、通识教育的历史 24
- 二、通识教育的概念 28
- 三、中国教育传统与通识教育 37
- 四、全球化背景与通识教育 42

第三章 通识教育课程理论

- 一、对通识教育课程理论的讨论 47
- 二、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实践 54
- 三、通识教育课程理论的解构 59

第四章 通识教育课程理论的发展

- 一、对课程本质的再讨论 62
- 二、现代课程研究的模式与趋势 68
- 三、后现代课程愿景 76
- 四、通识教育课程理论的发展 83

第五章 通识教育课程编制

- 一、对课程编制理论的考察 93
- 二、通识教育课程编制的改革 105
- 三、通识教育“联结课程”编制的理论 119

四、通识教育“联结课程”编制的案例·····	124
第六章 我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实践	
一、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131
二、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141
三、我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模式·····	145
后 记	
(一) 中国书院遐想 ·····	162
(二) 关于开设“大学人文”课程的思考 ·····	166
(三) 大师、大楼和大学通识教育 ·····	168
参考文献 ·····	172

导 言

（一）本书写作的基本考虑

我们今天的世界已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从“华沙条约”到“世贸组织”，世界逐步由对抗走向了合作。在这大变革时代，我国社会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色，同时又处于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从思想启蒙到经济建设，目前创新型国家及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对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就宏观历史的视角，中国现代大学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如何使其成为中国的现代大学，而不是在中国的现代大学。就社会反映而言，我国大学人才培养的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创新能力培养不够，知识能力比较单一，人文素质比较薄弱。因此，面对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挑战，我国大学本科教育必须进行系统的改革，其中推进通识教育是改革中一项非常重要的选择。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现代大学目前过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存在许多弊端，对其工具理性过强的改变需要加强通识教育。另一方面，也是根本的方面，人具有主体性，育人的本质是发展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解放需要加强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源于古希腊、古罗马自由教育的思想，是现代大学教育中得到普遍认可的理念或模式。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开始于 20 世纪初，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走向了过于专业化的道路。因而，我国大学今天推进通识教育遇到了许多制度性的困难，有理论的不足，更有实践的困惑，特别是错误的价值导向使通识教育陷入困境。广义上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受教育的人”，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狭义上通识教育是一种相对于专业教育的模式^①，如具体体现为系列的通识教育课程，并与专业教育课程相对应。通识教育自产生以来，由于社会背景、教育哲学和教育理念的不同，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课程理论。台湾学者黄俊杰归纳为精义论、均衡论和

^① 专业教育认为大学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各专业实施的是一种各自的专门教育，主要是适应社会需要的，目的具有外在性。通识教育则认为大学教育虽是培养专门人才，各专业却有共同的“教育”，主要着眼于人的发展，目的是内在的。

进步论。通识教育是伴随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实践而不断发展的,其实践的视角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滞后,从而导致通识教育课程理论的不足。上述三种课程理论共同的哲学基础是结构主义意义系统,结构主义认为意义是有秩序的、有等级的制度组织,可以通过客观的、不带个人色彩的探究而发现一种具有唯一性的真理。这一理论基础,决定着上述三种课程理论在本质上属于课程的科学范式,从而也导致了其必然的缺陷。

后现代课程理论是对现代课程理论的一种超越,认为课程是开放的、互动的、共同的对话。近现代教育由于受科学主义的影响,表现出教育方式模式化、教育过程程序化、教育手段精细化等简单化的倾向。教育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一方面我们的知识是分离的、被肢解的、箱格化的;另一方面现实和问题愈益成为多学科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整体性的、全球化的,并且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基于后现代教育观,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是一种整体与均衡的教育。教育的真谛是启迪,自由教育是通识教育的灵魂。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必须是“一般智能”的培养,在价值追求方面要培养理想主义的思想,在认知方面要促进知识的“整体”与“贯通”,特别是要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另外,基于全球化及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价值矢量应为培育中国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性。因此,人文精神的培养是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纵观通识教育发展的历史,课程研究在博弈中不断改革,课程开发在实践中不断前行。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编制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上述三种课程理论的思想,各校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虽各有所侧重,但普遍结合了上述三种课程的理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上述通识教育的三种课程理论及其实践中的融合,没有充分体现通识教育中“整体”与“贯通”的目标。因此,当前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要从拉莫斯地图及泰勒的课程结构,转向一种生态的、生成的、开放的过程概念,促进大学课程中各个知识系统的联结应成为通识教育课程理念的核心。在课程编制方面,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需要从精义论、均衡论和进步论逐步转向联结论,需要对当前大学中实践的经典名著课程、分布式必修课程及核心课程进行拓展,编制联结课程与学科课程相结合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课程设计的基本原则是整体性原则、关联性原则和生成性的原则,课程编制要打破传统的学科中心模式,选择跨学科或多学科交叉的问题中心、方法中心和意义中心的非学科中心模式。

关于通识教育模式的理解可归纳为两类:一是关于实施什么样的通识教育的理解,如核心课程模式、经典名著课程模式等;二是关于如何推进通识教育的方法。笔者将后者定义为实践模式。我国现阶段的大学通识教育实践模式大

致归为四类：三段模式、实验班模式、本科生院模式和书院模式。针对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参照国外的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可学习德国的方法，走隐性通识教育的路径。因此，推进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必须把握好三个关键环节：着力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及课程体系建设、构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建立良好的选课制度保证通识教育的实施。

对于通识教育，实际上美国大学也一直未完全达成共识。在这个专业化不断加剧及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如何学会思考与表达、如何培养广泛的兴趣、如何树立合理的价值观，这些都是现代大学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地区（除香港、澳门外）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步伐是缓慢的，只有少数大学在进行一些不是很系统的实践，相关的研究也不是很多，研究与实践氛围不浓。2011年，我国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未明确提及通识教育。2013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教改〔2013〕1号），其中在探索创新人才培养途径的内容中提出：“鼓励和支持高校结合实际，探索通识教育新模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笔者出版了本著作，希望为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与实践增加点氛围。

本书出版得到了湖南大学“985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支助。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一定存在不少错误，恳请同行们批评指正。

（二）现代大学到底怎么了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的来说批评的意见多于肯定的评价。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临终前对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发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成为21世纪初，中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国现在的大学培养创新人才不够？在问题的背后，显然有两个前提假设：一是外国大学（主要是指美国）培养了创新人才；二是中国以前的大学（指民国时期）培养了创新人才。从事实的角度，上述两个假设是有依据的。但仔细分析，未必如此。中国民国时期的大学办得比较有生气，改革之风盛行，主要是教育家办学。人们所指创新人才的标志意指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的成就与当时的教育和研究环境有十分重要的联系，他们都是长期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关于美国大学教育，其实相关的批评也不少，如《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濒临灭亡的大学》、《扼杀大学灵魂》等著作。当然，美国现代大学教育是让美国人骄傲和自豪的。相比较而言，我国现代大学的差距很大。其差距不只是

在硬件上,更多的是在思想与管理层面。如在教育理念方面,我国教育历来是培养“听话的人”,基本没有批判性思维;在方法上,我国教育长期的一统化模式和灌输式教学,个性培养几乎没有;在内容方面,我国大学专业确定过早,跨学科内容基本不涉及。与我国明显不同的是,美国高等教育完全是多样化的,对通识教育普遍比较重视,教师对教学普遍比较投入,教学过程的要求较高(学生反映课外的学习任务较重)。

中国教育的问题很多,只能一步一步来,或者说要多管齐下。回顾相关的改革历程,先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教学内容的大改革,后来是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在教学工作机制方面,有学分制改革,双专业、双学位等改革,主要是围绕增加选择性的思路,后来有的学校实行了大类招生与培养,有的甚至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在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方面,基本上是走下坡路。在上述改革中,各学校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时也会向后走,这其中管理行政化带来了许多弊病。

那么,如何培养创新人才?这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一是研究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然后缺什么补什么。归纳起来,在大学,创新人才培养途径大体有个性化培养、小班授课、导师制、研究性教学、引进国外先进课程体系、双语教学等。二是分析教育所存在的根本问题,让教育回归到教育,把人培养成人。笔者认为后一思路是根本的方法。笔者结合长期对我国大学教育的思考,认为我国大学教育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思想问题和方法问题。

这里所谓的思想问题,即应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理念的问题。

《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代大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大学真正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改变?联想到北京大学毕业生卖猪肉等现象,我们不得不思考,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现代大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大学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直是一个在探讨之中的话题。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理解:人文学者们呼吁要培养心智、操守及分析判断能力,提倡博雅教育;专业教师要求加强专业教育,培养学生的研究开发能力;受市场影响,还有学者提倡要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提倡开设实用性、职业性课程。现代大学大的趋势是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但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薄弱让人们感到十分担忧,教育如何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得到兼顾?我们的教育理念需要认真地梳理,其中“成人”是根本的和基础的,“成才”是长期和发

展的。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应具备中国人文精神与科学素质，道艺统一^①。

关于方法的问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如何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关键是如何开放学生学习的选择性和加强对学习方法的指导，学分制、选专业、转专业、双专业等制度要广泛探索，深入推进。关于选修制，哈佛大学埃利奥特校长是最坚决的倡导者。到1901年，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校选修课比例达到70%。到1909年，哈佛大学必修课只剩下一年级的英语写作课与外语课。康奈尔大学怀特校长也非常推崇学生自主选修，他认为：培养心智必须方法得当，不能向学生的头脑灌输他不愿学习的知识。刻苦学习固然重要，但只有学习时充满热情与兴趣，心智锻炼效果才会最好。当然，美国大学完全自由选修制的效果是十分不理想的，即使哈佛大学最后也很难坚持下去。因此，后来确定了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方法，要求学生选修一门专业（必修系列课程），从而促使课程体系深度与广度于一体。相反的是，我国大学长期计划经济的模式，必修课过多，选修课过少。因此，我们的改革任务是如何增加学生选修的比例。

如何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一个好的教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心中有学生，总是为学生着想，以学生为本，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二是有责任心，教书是老师的天职，我们的工作要对得住学生、家长，要对得住良心；三是要有较高的学术及教学水平。技术性的东西是其次的，重要的是师德的修养。

如何建立一种好的教学模式，改变长期如此的灌输式现状。班级教学的方式曾经是推动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但同时也滋生了灌输式教学模式，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班级教学演变成了讲演教学。因此，小班讨论课、研究性教学要下大力气推行。讨论课不能是助教上，难上的课应该是教授上，否则适得其反。

如何开展通识教育，解决价值观、文化自觉及培养广泛兴趣的问题。复旦大学医科研究生黄洋遭投毒身亡，让我们痛定思痛，不得不再一次思考——教育究竟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0世纪美国大学几次大的反思，无一不加深了对通识教育的深化和重视。因此，我国大学要认真研究我们通识教育的问题，认真探索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模式。

^① 涂又光（1927—2012）在《中国高等教育史论》中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文阶段，重道轻艺；近百年的科学阶段，则重艺轻道。重艺轻道的恶果，不止可能丧失“中国人”的特色，而是丧失“人”的特色。因此，现代大学教育必须回归新的道艺统一。

（三）现代大学向何处去

——读《后现代大学来临?》^①后的思考

1. 大学发展的简单历史

现代大学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开始于1088年创建的博罗尼亚大学），标志性的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等。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的解释，“大学”是教师和学生聚集在一起探讨高深学问的地方。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大学的使命是传道、授业，在明明德。我国现代大学以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为标志，历史是一百多年。自大学产生以来，教学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基本教学方式没有多大变化。今天的大学不再是“象牙塔”，也不再“两耳不闻窗外事”，已成为各国社会与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如克拉克·克尔所说，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大学理念”中的大学是一个住着僧侣的村庄；“现代大学理念”中的大学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小镇，这是一个单一产业的城市；“巨型大学理念”下的大学，则是一个充满无限多样性的城市。尽管巨型大学的理念有些激进，但大学的这种变化是必然的。大学已广泛地融入到了社会发展之中，学者们不再只是教书，科研与社会服务成为了他们的热门话题。如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三大奖，全国高校共获得214项，占总数的72.5%。其中，高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157项，占总数的53.2%，高校已成为科学研究的主力军。

因此，传统大学模式（精英、寄宿制、离群索居）正在被开放、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北美和欧洲模式取代。如大量的专业文献在讨论“如何有效地开展大班教学”、“怎样具备创业精神”的问题。大学最初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判断力”，现在大学精神由追求卓越变成了适者生存。在许多大学，教师与学生的亲密关系已荡然无存。如今师生之间的对话变成了远程学习、自主学习、大班教学、网上答疑。大学正在由师生“共同体”世界（教师和学生有着强烈的整体意识）向由不同陌生人组成的“联合体”世界（人们之间的精神联系极少）转变，由“学术社区”向“学术协会”转变。

^① 安东尼·史密斯，弗兰克·韦伯斯特主编，后现代大学来临，侯定凯，赵叶珠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

2. 今天的大学遇到了什么挑战

众所周知，当前大学教育正在经历着重要变化，遇到了以下挑战：

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潮流正在遍及世界各地。大众化后，高等教育赋予学生的优越地位已大大下降，因而大学生对其他竞争优势的兴趣明显增强，从而强化了教育的功能主义和学生的工具主义思想。大学生不再是时代骄子，需要通过获得实际技能增加其竞争力，因而很难潜心学术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学术和院校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劳动的强度显著提高，大学科研也更强调实际产出，清静悠闲的传统已难以持续。潜在的影响可能包括：师生之间、学术同行之间的关系日益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官僚的咨询、指导、质量保障制度。

二是获得和分析信息、知识的新渠道层出不穷，新技术的使用意味着高等教育已超越了传统校园在物理和空间上的限制，大学不再像从前那样拥有知识与技能传授的垄断权。同时，信息网络能随时随地把教育服务传递给任何人，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改变了传统的学习、思考和交流的方式，学习资源提供的自由性、开放性增强，学习需求的个性化、多元化凸显，教与学的关系将发生深刻变革。未来个性化学习社会的教师更应当是活动的组织者、学习的引导者、资源的开发者，而且他本身就是学习者——一个终身学习者。

三是知识本身也在变化，永恒的价值不断受到挑战，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盛行于各个领域。

四是后现代意识的出现及其广泛传播。后现代思想认为，学术界是一种虚构的存在，差异性在大学内部和大学间的基本特征。如里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1979年指出，建立（或破坏）学术声誉和影响力的基础在逐渐而持续地转移。过去，这一基础是学术同僚们共同积累起来的资产。到了20世纪上半叶，这一资产的管理权转移到了出版社。出版社掌控学术资产的情况仅仅维持了几十年，管理权再次转移，大众传媒成为了主角。德布雷指出，学术权威曾经由前来听课的人数多少来决定，后来取决于专著的销售量及评论界的好评。如今，这两种评价方法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电视上镜时间和报纸版面已成为新的学术评价标准。笛卡尔曾经有“我思故我在”的名言，今天我们或许可以用“我被谈论，故我在”来描述学术权威的现状。因此，制订高深学问的多样化标准是大学系统迎接后现代挑战的必然选择。

大学的上述危机来源于什么？相关研究者认为，其更多源自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普遍存在身份模糊、权威分散以及生活的不断碎片化，即“后现代社会”的来临。身处这样的时代，富有历史内涵的大学自然感到无所适从、忐忑不安，游离于“永恒”和“进步”（即永恒主义与进步主义，现代性抛弃了永恒

主义,后现代性抛弃了进步主义)的双重废墟之间,从而也否定了我们对大学标志性的认识,即大学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探寻高深学问的场所”的认识。于是,我们要问:大学的本质是什么?

3. 现代大学向何处去

一方面,现代社会中大学的功能日益专门化、专业化,大学需要为各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及社会建设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面对商业、产业模式的巨大成功,大学迫不及待地重塑自己的形象。实际上,现代大学不是靠培养智慧和批判性能力的教育宗旨来吸引学生(当然也可能吸引不到学生),而仅仅是履行与客户的合同义务,向他们授予得到社会认可的文凭证书,借助这些证书,学生可以确保拥有物质和精神上的(但通常是市场的)价值。当然有人(克里尚·库马尔)提出^①,大学对市场及商业制度的模仿,将注定以失败告终。因为,大学既没有强大的组织资源,也没有合适的人力资源。

在古代,由于知识的相对有限,因此教师很注重传道。在近现代,随着科学知识的迅速发展,授业基本占据了教育的全部内容。在今天,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授业的渠道变得广泛多样。这样,大学教育又以什么来证明其合法性?大学从兴起到现在已有近千年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中除宗教之外保持最久的组织。从这一角度看,大学应向宗教学习。大学教育必须回归传道的理想。

过去人们对学术信念的执着程度要远胜于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领域的知识千差万别,很难找到一种统一的学术研究方法。因此,是否只有“教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才是大学的特征?一方面大学是群贤毕至的地方,在大学里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流思想,而在社会上却没有这样的自由。另一方面,如果大学仅仅以传授知识与技能为己任,那么它的垄断地位将岌岌可危。大学应该成为人生中的一个个驿站。在这样的大学里,无论长幼,大家都能反思一些事情,特别是得到道德情操的熏陶、心灵和精神感悟(不仅仅是智力的培养)。因此,大学需要保持和发展高雅文化,并保持集体与寄宿制的生活形式的精髓,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在英国,没有地方可以像牛津城那样给人以良好的教育机会。一边是泰晤士河的美丽建筑和迷人的乡村景色,另一边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里的迂腐和百无聊赖。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地方,拥有足够的学习时间,携手志同道合者分享这一探寻的过程。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庞大的学生数量动摇了精英教育的思想。因此,

^① 安东尼·史密斯,弗兰克·韦伯斯特主编,后现代大学来临,侯定凯,赵叶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

传承了博雅教育传统的通识教育受到了很大挑战。后现代的转变使作为大学理性文化准则的所谓真理和客观性发生了动摇，而正是这些传统构成了核心课程的基础。当然，现在仍然有人在勇敢地维护着芝加哥大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确立的围绕经典名著阅读的核心课程，不过从现在的种种迹象看来，这一课程的未来已岌岌可危。因此，通识教育目标及内容均需要改革。文化传承、启迪心智、培养批判与反思精神是通识教育的主要目标。

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人才培养，大学在创立后的 700 年历史中是以人才培养为唯一使命的。到了 200 年前，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将科学研究带到了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成为大学新的发展轨迹。后来，美国大学建立了大学的第三使命，即社会服务的功能。大学是否要发展第四功能？有人提出文明交流与融合的使命，解决人类文明冲突，加强国际化，将不同文化置于同一平台上开展交流与合作，这将是大学功能发展新的趋势。

第一章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1.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教育转型

中国现代大学面临两个大的时代背景，一是全球化，二是后现代。本著作重点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现代大学如何开展通识教育及通识教育课程的改革。什么是全球化？菲利普·G. 阿特巴赫在《全球化与大学》一文中将全球化定义为：“对高等教育有着直接影响的广泛的和不可避免的经济、技术和科学发展趋势。院校系统和机构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容纳和体现了上述方面的发展趋势，并且无法忽视这些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包括，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运用、科学交流中通用语言的使用、高等教育大众需求等。”美国人弗里德曼在 2005 年出版了《世界是平的》一书。他说：“500 年前，哥伦布归国后向国王和王后汇报说，地球是圆的。而我回到美国（从印度班加罗尔），只是悄悄地和我太太分享了我的发现。我悄悄地对她说‘地球是平的’。”21 世纪，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使世界的距离为零；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柏林墙的倒塌，从国际化、跨国公司到服务外包、离岸经营，乃至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这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世界变平，规则在变，观念在变，角色也在变……

另一方面，近百多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国民求生存、发展而起的各种变革运动中，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启蒙，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1949 年新中国成立，1978 年改革开放快速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基本特征是救亡和图存，求民族独立，求国家富强，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性）社会向一个现代性社会转变。在这百余年的变革中，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的文明秩序（一个主要以儒学三纲六纪为规范的帝

国秩序^①)已土崩瓦解,而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还远远没有建立,今天仍处在一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今日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下,“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绝不只是军事力量,甚至不只是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毋宁更是知识力、文化力,特别是它拥有一套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②

“社会转型”一词源自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它是英文 social-transformation 的中文译释,指传统的原型社会的规范结构向发展逻辑的高层次的演化。发展逻辑乃是一种实践模式,是指对社会结构系统加以理性重建,并成为具有包容力和现代性的结构层级模式。在我国,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的关注,由于各自的出发点和学科背景不同,在具体认识方面各有不同。有关研究成果认为,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社会的发展也即人的发展。

教育转型是作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构成部分而提出的。从“社会转型”的一般意义来理解“教育转型”,它是指教育结构及其存在方式的整体变化,它导致教育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由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核心是人的现代性,因此,教育转型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教育教学的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

就高等教育而言,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于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起步晚,底子薄。因此,一开始完全是学习和模仿西方现代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教育方面采用了前苏联教育的模式。我国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教育和其他方面一样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生长在一个奋发图强、赶超英美、科学主义绝对主导的时代,同时加上教育管理的行政化和意识形态化,在我国现代大学工具理性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因此,我国高等教育转型的首要任务是要改变人文教育薄弱以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分离的状况,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2. 我国教育转型的价值矢量

教育之所以是教育,当以人的培育为核心。所以,人的生存状态,决定着

①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即: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第一纪诸父,即父亲叔伯这一辈;第二纪兄弟;第三纪诸舅,即母亲这一系;然后是族人,即自己家族里的一批人;最后是师长和朋友,此乃六纪。

② 资中筠,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4~55。

教育的存在状态。因此，我们对教育转型价值的考察，选择的不应是教育的社会形态，而是人的发展形态。从主体的角度考察人类的发展，马克思把人类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归结为三种存在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的最初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形态、以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为基础的最高形态。有关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的三大形态，反映了不同社会人的发展状态，分别是群体主体下的依附性人格、个人主体的独立人格、类主体的自由人格。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三种发展状态相对应的是三种形态的教育，即群体主体的依附性教育、个人主体教育和类主体教育。”^①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人的独立性开始增强，依靠商品经济形成的自由、自愿、平等交换关系开始出现。这些都打破了对人的依赖关系，促进了个体独立人格的形成。所以，教育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致力于发展人的技术理性，培养人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独立自我的人格。

从农业社会无个人主体的依附性教育到工业社会人的主体教育，这是教育形态的第一次转型，这一转型极大地解放了人，促进了人的自由和发展。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主体性，孕育着人的发展的不完善性。在当代社会，其表现越来越明显，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技术理性张狂，价值理性的迷失；单子式的自我存在对他人存在的漠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与竞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霸权主义导致人类战争频繁发生，和平的丧失；人类中心主义导致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的生存家园得以破坏等。这一切问题在根源上就源于个人主体性的发展。所以，有学者指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人的生存状态经历了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附性’的历史转型，其结果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它既使人获得了独立性，又使人陷入了主体性的困境”^②。

如何走出个人主体性的困境？“人类活动范围的世界化走向、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全球相互依赖的多种表现形式，标志着‘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真正形成，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是世界历史性的、类的存在。”^③因此，单子式的个人主体性也因此转变为主体间性，理性与价值、个人与他人、社会和自然的分裂状态将转变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和

① 冯建军，论当代中国教育的双重转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② 孙正聿，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中国社会科学，2001（5）。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5~28。